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马晓春 / 著

Hangzhou ShuYuan Shi

杭州书院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杭州书院史

马晓春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州书院史 / 马晓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6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161-6352-8

I. ①杭… II. ①马… III. ①书院—教育史—杭州市
IV. ①G649.29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46740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王丹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国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印刷厂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59千字

定 价 50.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沈 翔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其煌	史及伟	孙 璐	张旭东
李志庭	何忠礼	陈 铭	林正秋
周 膺	徐吉军	顾志兴	顾希佳
薛家柱			

目 录

绪论	1
一 书院是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	1
二 杭州书院在中国书院史发展中的地位	2
三 杭州书院发展与地方人文	3
四 研究现状与史料概述	4
第一章 唐至北宋时期杭州书院的起步	7
第一节 唐五代时期杭州书院的萌芽	7
一 杭州书院的源起	7
二 唐五代时期的杭州书院	9
第二节 北宋时期杭州书院的初步形成	10
一 北宋时期杭州书院概况	10
二 北宋文教政策与杭州书院发展	12
第二章 南宋时期杭州书院的成熟	17
第一节 南宋时期杭州书院概况	17
一 南宋杭州书院发展的契机	17
二 南宋时期杭州主要书院列举	18
第二节 南宋时期杭州书院成熟的表征	23
一 南宋时期杭州书院的规范化发展	23

二 南宋时期杭州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发展	25
第三节 朱熹与杭州书院	28
第三章 元代杭州书院的缓慢发展	31
第一节 元代杭州书院概况	31
一 史志中的元代杭州书院	32
二 留存至今的元代杭州书院记	34
三 元代杭州书院的规模与活动	46
第二节 元代杭州书院的官学化	47
一 创建官办书院	47
二 控制书院的领导权	48
三 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	49
第三节 西湖书院：国家重要的出版中心	51
一 西湖书院的藏书事业	51
二 西湖书院的刻书事业	52
三 西湖书院重整书目	53
四 西湖书院成为国家出版中心的原因	57
第四章 明代杭州书院的繁荣	61
第一节 明代杭州书院的发展轨迹	61
一 明代前期杭州书院的百年沉寂	61
二 明代中后期杭州书院的繁荣	64
第二节 明代杭州书院繁荣的体现	69
一 书院数量剧增	69
二 书院规模扩大	72
三 书院类型丰富	72
四 书院活动充实	74
第三节 王阳明与杭州书院	80
一 王阳明的书院教育思想	80
二 王阳明与杭州书院发展	88
三 阳明后学与杭州书院发展	91
第五章 清代杭州书院的普及与嬗变（上）	95
第一节 清代杭州书院发展概况	95
一 清初杭州书院的停滞	95
二 清前期杭州书院的复苏	96
三 清中期后杭州书院的普及	98

第二节 清代杭州书院普及的特点	105
一 数量多, 分布广	105
二 速度快, 规模大	109
三 层次鲜明, 组织有序	113
四 活动丰富, 管理规范	115
第三节 清代杭州四大书院	122
一 敷文书院	122
二 崇文书院	124
三 紫阳书院	125
四 诂经精舍	126
五 四大书院的部分书院记与碑文	129
 第六章 清代杭州书院的普及与嬗变(下)	 139
第一节 杭州书院的变革	139
一 书院的官学化和科举化	139
二 近代新观念的生成	152
三 杭州书院的变革	155
第二节 杭州书院的改制	168
一 书院改制的前奏	168
二 杭州书院的正式改制	171
三 书院改制与杭州现代教育的催生	174
 余论 民国时期的杭州书院现象	 177
一 灵峰精舍	178
二 浙西天目书院	180
 主要参考文献	 185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书院是其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书院在杭州的人才培养、学术文化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展示杭州书院的历史发展，可以为人们解读杭州灿烂文化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一 书院是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自唐代中后期至清末赓续千余年，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000所以上。书院对中国教育、学术、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繁荣，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书院之名始于唐，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许多学者依据袁枚的这段文字，认为最早使用书院之名的是唐玄宗时期的官办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其性质相当于官方的图书事业机构）。但据邓洪波先生考证，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的张说书院，均出现在唐初，时间上比丽正、集贤书院早近一个世纪。

书院出现不久，就沿着“聚书——读书——聚众读书”的路径，将书院的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众人，并开始有了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中唐以后，不少民间私家藏书楼舍、读书堂院，也逐渐演化为学者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的场所，从而产生了最早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

北宋时期，因战乱被破坏的各类官办教育组织尚在恢复之中，唐五代时期民间兴办的书院成为容留士人读书的主要场所。读书人在其中开展藏书、读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

等各种活动，进行着文化研究与传播事业。书院的影响日益扩大，开始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受到官方的重视，出现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泰山书院等许多闻名全国的书院，兴办书院也成为一股潮流。

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大师以书院为载体，传播理学思想，使理学借助书院得以发展成熟并形成学派，书院也因讲授理学而扩大完备，达到成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此后，书院开始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中占有显著地位，历经元明，在清代达到普及与繁荣，至20世纪初方被现代学校所代替。

在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书院形成了许多显著的特点：办学上不受地域限制，实行“门户开放”；学术研究上体现“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教学上启发学生自学能力，强调教学与学术相结合；师生关系上相处融洽，注重培养师生感情等。正是这些特点，使书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

二 杭州书院在中国书院史发展中的地位

杭州的书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颇具影响，在中国书院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杭州是最早建有书院的地区之一。杭州在唐代就已出现书院，唐代诗人翁洮在寿昌县（今属建德）西南10里创建青山书院。青山书院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一批书院之一，关于青山书院，在万历《寿昌县志》中有明确记载：“青山书院在县西南十里，去航川里许青山之阴。唐隐君翁洮建。遗址犹存。”此外，还有建德大慈岩镇吴山边村的方塘书院，据《吴山边村吴氏宗谱》记载，吴钦和翁洮都曾在方塘书院讲学，“钦，好学重友，与翁洮讲学方塘书院”。

其次，杭州书院数量多，分布广，名院辈出，是我国书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统计，杭州的书院，在唐代为2所，五代为2所，北宋为10所，南宋为17所，元代为8所，明代为51所，清代为61所。尤其是到了清代，杭州书院的发展已经达到普及的程度，书院不是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县城，一花独放，而是遍及杭州各县，即便乡镇村寨也可觅到书院的踪影，覆盖面之广体现了杭州书院之发达。

同时，杭州出现了几所在全国拥有一定影响的书院。如杭城的西湖书院、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淳安的瀛山书院，桐庐的钓台书院，余杭的龟山书院等，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它们或是全国的出版中心，或以其培养的人才而闻名于世，吸引了许多外地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杭州求学。

再次，杭州引领了全国书院的变革。到了清代，书院因过度官学化和科举化而积弊日深，备受世人诟病。嘉庆五年（1800），阮元在杭州西湖孤山创立了诂经精舍，诂经精舍推崇乾嘉汉学，注重经史训诂，在其学术示范下，全国先后有几十所书院仿照诂经精舍设置课程、制订学规以谋求变革。光绪二十三年（1897），廖寿丰、林启在杭州创办求是书院。求是书院在教学内容上兼课中西，在形式上兼具传统书院和新式学堂的优势，在全国书院变革中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三 杭州书院发展与地方人文

杭州书院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唐五代至北宋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杭州书院的起步期。

杭州书院起源于民间。唐五代时期，从世家大族创办的家学和隐士的个人读书治学之所中发展出杭州最早的4所书院：青山书院、方塘书院、上贵精舍和径山书院。这几所书院虽以“书院”或“精舍”命名，但尚不具备后世书院聚徒讲学、藏书和祭祀的功能。北宋庆历四年（1044）后，随着朝廷发起的三次兴学运动，杭州的教育事业全面起步，书院也顺势发展。到了北宋后期，杭州已出现十余所书院。

南宋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杭州书院的成熟期。

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杭州后，杭州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书院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书院的数量和建置规模都超越北宋，在讲学、藏书和祭祀三大事业上逐渐形成规范。同时，书院实现了与理学的一体发展，开创出书院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传统，使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并达到成熟。

元代为第三阶段，为杭州书院的过渡期。

元代，政府实行官学化的书院政策，虽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纪录。但杭州书院由于源于民间并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兴盛，官学化书院政策导致杭州书院失去了发展动力，使得杭州书院在数量上不足10所，发展也相对缓慢。元代杭州书院发展中最大的亮点是至元三十一年（1294）浙江廉访使徐琰在南宋太学旧址设立的西湖书院，西湖书院是一所主要从事藏书刻书事业的书院，是全国的出版中心。

明代为第四阶段，是杭州书院的繁荣期。

明代杭州书院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越了以前各代（创建和修复书院达51所），且书院的类型也日趋丰富，发展出祭祀式书院、讲会式书院、考课式书院等新型书院。此外，书院的日常活动也更加充实。明代中期，王阳明设书院，办讲会，宣传阳明心学。王阳明去世后，王门弟子书院聚徒讲学数十年不辍，使书院讲学之风大盛。明代杭州书院的繁荣，与王阳明及其弟子的书院讲学有密切关系。

清代为第五个阶段，是杭州书院的普及和嬗变期。

清代官方强力进入书院建设，推动了书院飞速发展。从康熙朝开始，杭州的书院受到朝廷的重视。朝廷重视和鼓励书院发展的政策，使杭州书院发展迅速，达到了普及的程度，尤其是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被誉为清代杭州四大书院，在学术和人才培养上成绩显著，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到了晚清，杭州书院面对自身的衰败和西学东渐的冲击，不断谋求变革：甲午战争前，以诂经精舍为代表，致力于恢复书院的学术追求；甲午战争后，以求是书院为代表，兼课中西、注重实学。正当变革进行之时，朝廷下达书院改制诏令，杭州书院被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在匆忙中走向现代。

杭州书院在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会集了大量学者名流，书院的山长主讲多为学术名家，他们以书院作为传播和研究学术的基地，促进了杭州学术文化的发展。杭州书院翰墨飘香，桃李芬芳，也为杭州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杭州“人文之盛，甲于两浙”。杭州书院多建

有藏书楼，重视对图书的收集，书院藏书为杭州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丰富了杭州的藏书内容。杭州书院刻印的一批有学术价值的书籍，推动了杭州的刻书事业。杭州的书院更是得山水之胜，吸引了文人骚客的往来，他们或流连西湖于秀美风光，或感慨于书院的文化渊源，创作了大量的诗篇，活跃了杭州诗文创作。杭州的书院自身亦是西湖景致之一，书院改制后，一些建筑被保留下来，如今已成为重要的人文景观：清代诂经精舍为山长俞樾建筑的俞楼，如今仍静静地伫立在西湖边；万松书院更因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成为人们心中的爱情圣地。书院为杭州留下的许多名胜古迹，成为今日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与珍贵遗产，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保护和利用。

四 研究现状与史料概述

书院改制不久，对书院的研究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目前，杭州书院的研究还甚为薄弱。关于杭州书院的研究著作，仅有马时雍编的《万松书院》（杭州出版社，2003年）和刘樟荣编的《天目书院古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其内容为两大书院发展历史及其功能、书院人物等基本情况的介绍，学术性相对较低。关于杭州书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黄克武的《诂经精舍与十九世纪中国教育、学术的变迁》（《食货月刊》，1983年，第13期），金达胜、方建新的《元代杭州西湖书院藏书刻书述略》（《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宋巧燕的《诂经精舍的文学教育》（《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卢康华的《俞樾与诂经精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张立的《杭州诂经精舍的科学教育》（《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陈东辉的《诂经精舍对19世纪浙江学术发展之重要影响》（《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等十余篇。这些论文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了诂经精舍和求是书院两所书院，并就其对中国教育、学术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论述。此外，在中国书院史研究以及浙江教育史研究的一些成果中，对杭州书院有所介绍，如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中收集了十余所杭州的书院名录和重要人物，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化丛书》中收集了杭州书院的楹联、学规、章程、揽胜、诗词等，王涵主编的《中国书院学记》中也收录了部分杭州书院的学记。

梳理杭州书院史，离不开史料。杭州书院的史料，主要记于书院志、书院记、各种地方志、历代文人的笔记、文集、日记以及一些家族的家谱、族谱中。但在明代以前，可供稽查的杭州地方文献中关于书院的记录往往只提及书院创建的时间、地点和创建人，至于书院内部规制、教学和学术活动开展情况、书院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等情况往往语焉不详，甚至不予提及，有时记载的史实还无法相互印证，这给本书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幸的是，杭州一些书院每遇重建、重修，或增田、刻书，往往有学术名家为其撰写书院记，散落在文人文集的书院记成为我们了解杭州书院的珍贵史料。

明清以来，杭州各书院开始编制书院志和刊刻课艺，这些书院文献成了研究书院发展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有：

《瀛山书院志》：《瀛山书院志》先后六次纂修，是了解瀛山书院发展全貌的重要史料。最早为明万历三十年（1602）方应时纂并刊刻，名《瀛山志略》，作十卷。续刻《瀛山

书院志》为明方应时之子方世敏辑，天启二年（1622）刊行。内容承续万历志，其中方世敏自订学规分格致、立志、慎修、戒傲、安贫、会文、尊注、通务、知命、惜阴十条，反映当年教学情况甚详。三刻《瀛山书院志》为方应时之孙方祖德辑，清顺治十一年（1654）刊。四刻《瀛山书院志》十卷，卷首一卷，清方宏绶辑，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知县闵鉴及拔贡毛绍兰鉴定。方宏绶，字绂奇，方应时裔孙，当时为贡生。志分十卷，卷一分形胜、营建、祀事，卷二学规，卷三朱子传，卷四邑贤侯考、乡先生考、流寓考，卷五以下为朱子、祭文、诗、碑记、行状、告文、揭示、呈文等各种艺文。卷首则载旧序及纂订姓氏，以明志书之缘始。前有闵鉴、钟元冶、毛绍睿、毛绍兰、方宏绶五序，后有章法、洪种茂、毛鹤龄、余泰基、方浦五跋。五刻《瀛山书院志》十卷，卷首一卷，清方季和辑，道光十六年（1836）刊。方季和，字心一，号调斋，明方应时裔孙。道光十二年（1832）起，方季和等倡率整修院舍，并辑此志。志分十卷，分形胜、营建、祀事、学规、朱子传、邑贤侯传、乡先生考、流寓考、朱子诗文、艺文等类目，卷首则载旧序、五刻姓氏、凡例、图。前有洪锡光、丁樾、方季和三序。六刻《瀛山书院志》十卷，卷首一卷，清方端辑，宣统二年（1910）刊。时距其先祖方应时明万历三十年（1602）首修院志三百余年。方端为方应时裔孙。志仍分十卷，沿承旧例而作续补，卷首为旧序、凡例、图。

关于《瀛山书院志》，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册收录了四刻《瀛山书院志》；湖南长沙岳麓书院藏有四、五、六刻本。

《杭州三书院纪略》：作者王同，少时就读敷文、崇文书院，后历主梅青、龟山及塘栖栖溪讲舍，又曾任诂经精舍监院、紫阳书院山长。因杭州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清代已声名远播，却未编辑专门的书院志，王同特撰《杭州三书院纪略》。该书卷一为《图说略》，卷二为《纪文略》，卷三为《纪诗略》，卷四为《院长纪略》，卷末为《考古略》。事实上，这是一部尚未定稿的稿本，卷中多处预留空白，尚未补录，但由于王同熟稔以上三书院情况，所搜集的资料尚称丰富，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诂经精舍志初稿》：张鉴撰写的《诂经精舍志初稿》，据目录称分弁言、严格、规制、学风、人物、艺文、流衍、附录等八章。但现仅可见到一至三章，刊登于1936年《文澜学报》第2卷第1期，内有对诂经精舍设立的过程、宗旨、规制、招收生徒、课程设置及经费等情况的记录。

《敷文书院志略》：魏颂塘的《敷文书院志略》，1935年由浙江财务学校铅印。此书不分卷，内容由魏颂塘根据明清以来有关书院志书以及碑记、图画、诗文纪述等编撰而成，故称纪略。

《浙江紫阳书院掌故征存录》：作者孙延钊，其祖父孙依言曾为紫阳书院山长，该书由孙延钊根据家藏的紫阳书院课艺，并收录《诂经精舍志初稿》和《杭州三书院纪略》中有关紫阳书院内容编辑而成。

《敷文书院课艺》：有同治九年（1870）《敷文书院课艺》和光绪四年（1878）敷文书院课艺》，收录生徒时文共320篇。

崇文书院《敬修堂词赋课钞》：共16卷，收录生徒词赋108篇，现仅存有10卷60课。

《崇文书院敬修堂小课甲编》：由山长戴熙鉴定，监院盛尧春（墨庄）胡琨（次瑶）校

订，戴熙作序，共收录十课课艺。

《紫阳书院课余选》：分2卷，卷1收赋9题29篇；卷2收诗25题。

《浙江紫阳书院课艺》八集：分8次刊刻，收录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光绪十七年（1891）2000余篇。

《诂经精舍文集》八集：自嘉庆七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02-1897）共刊印8集，收录精舍师生经史论文及词赋等2000余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研究诂经精舍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予以收列，许宗彦亦评价说：“所载于古今学术，洞悉本源，折衷无偏，实事求是，足以发明坠义，辅翼经史。其余诗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风标峻上，神韵超然。盖吾师因其质之所近以裁之，而诸君亦各能以长自见。览斯集者，犹探珠于沧瀛，采玉于昆阆也。”^[1]

上述书院文献是杭州书院史写作的重要依据，本书的书名为《杭州书院史》，这里的杭州是指今天杭州市所属市区及5县（市、区）的大杭州，本书对书院的考察、统计均以现在的杭州政区为准。在历史上，杭州的行政区划常有变化，一些位于杭州和其他地区交界处的书院之归属问题给本书的研究带来一定困扰。笔者尽力根据掌握的史料予以考订，但受文献资料和笔者能力的限制，难免有所疏漏，敬请谅解。

毋庸讳言，本书的写作还很不成熟，对史料的搜集还很不完整，在不少地方仅仅是梳理了相关史料，对史料相互冲突之处，尚未进行严密的考订，一些论点也还有待修正，恳请广大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以期能进一步完善杭州书院研究的成果。

^[1]（清）阮元：《诗经精舍文集》卷首，清嘉庆七年扬州阮氏琅环仙馆刊本。

第一章 唐至北宋时期杭州书院的起步

杭州的书院兴起较早。唐五代时期，从世家大族创办的家学和隐士的个人读书治学之所中发展出杭州最早的书院，到了北宋时期，国家掀起了三次兴学运动，杭州书院也借势起步，有了初步发展。杭州书院的发展，在全国书院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一节 唐五代时期杭州书院的萌芽

杭州有着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家学尤为发达。到唐五代时期，从私学中发展出杭州最早的书院，此时的书院还不具备宋以后书院的典型特征。

一 杭州书院的源起

杭州的书院，肇始于民间私学，而无官方源头。唐五代时期，杭州出现了一些用书院或精舍命名，有一定教学活动的机构，它们或从家学发展而来，或脱胎于士人读书治学的书斋，成为杭州最早的书院。

私人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其私学规模已相当可观。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私学大盛。秦代采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民间私学传统却并未中断。两汉时期，官学虽不断扩大规模却无法广庇天下，因此，蒙学教育、大部分专经教育、儒学外其他学派教育都是由私学承担，使私学蓬勃兴起。两汉有姓名可考的私家教授即有三百六十多人，寻师学习的弟子数量也十分可观，史籍记载西汉时已有经师所授

生徒达数百乃至上千人,东汉私学弟子数量更是大幅上升,蔡玄、魏应、张兴、牟长4家弟子达万人,其他如杨厚弟子上名录者3000人,曹曾门徒3000人,周磐教授门徒常千人,宋登教授数千人等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专门提到汉代私学兴盛情况说:“私家传授之盛,古所未有也。汉人讲学,必从师者,以家无书籍,传写不易,非专家之师授以章句,无由得而成学也。后汉书虽已有卖书于肆者,疑亦只京师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无书。以此之故,从师受业者,往往不远千里,或佣作执苦,以助读书之资。”^[1]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

汉代私人讲学不仅名师迭起,规模较大,而且开始建立相对固定的场所,称讲堂,或精舍、精庐。私立精庐,开门授徒,在两汉已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范晔在《后汉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私学兴盛的情况:“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又作‘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著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2]

^[2](宋)范晔:《后汉书》卷67,《儒林列传》,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

两汉的讲堂,或精舍、精庐,虽然它不可能有如后世的书院那样丰富的藏书,生徒自然也就不可能凭借书籍、在老师的指导下自由研习,讲学主要靠师徒口耳相传,在教学方法上与书院有很大的不同,但它选址办学、私人兴建、延师授徒,则与后世的书院如出一辙,后代研究书院者往往将汉魏以来的精舍或精庐看作书院教育的前身。清人黄以周就说:“今之书院,在古为天子藏书之所,其士子之所肄业者,在汉谓之讲堂,亦谓之精舍,或谓之精庐。”^[3]他还把汉孝文帝末年蜀守文翁立的精舍称之为“书院之权舆。”到了唐代,民间一些读书人将自己读书治学之地命名为书院,并逐步演变成聚书建屋、授徒讲学的场所。

^[3](清)黄以周:《微季杂著》,卷4,《史说略》,光绪二十一年(1895)南菁书院刊本。

杭州有着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家学尤为发达。西汉末年,战乱频繁,致使大批中原儒士南移,从而促进了荡涤民风的转变和儒家思想的流传,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文化世家,形成了“学在家族”的格局。六朝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纷争而起,为树立和维系自己家族的门风,扩大社会影响,提升政治地位,世家大族一般十分注重对族中子孙的教育,不仅传授儒家经典,而且十分讲究治学态度和方法,还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到六朝时期,杭州的家学已十分兴盛,《浙江通志》记载钱塘范氏家学传承情况:

孙吴,范平以儒学知名于世。卒后,谥号曰文贞先生,贺循勒碑纪其德行。他的3个儿子并以儒学至大官。南朝,范述曾从余杭人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学徒常有数百,独称述曾曰:“此子必为王师。”齐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时,高帝引述为之师友。注《易》、《文言》。范悦之,太学博士征,不至;其孙范元琰好学,博通经史,兼精佛义。^[4]

^[4]王志邦:《浙江通志·秦汉六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隋唐时期,杭州虽已开始建立起官学,但并不普遍。咸淳《临安志》记载了唐代杭州州学“在通越门外”,富阳县学建于唐武德七年(624),新城、昌化也

已有县学存在。唐代杭州的州县学中大多为庶族子弟。由于家学发达,世家大族的子弟一般在家学接受教育,世家大族往往于风景名胜之地修建供本族子弟读书治学的场所,以书院命名,由此产生了杭州最早的书院。可见,家学是杭州书院产生的一个重要源头。

杭州书院产生的另一源头是士人读书治学的书斋。唐五代时期,士人隐居山林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官场失意的士人或名师宿儒为了躲避世俗的烦扰,选择远离市镇、风光秀丽的名山大川与风景胜地作为修身养性之所,在这些地方读书治学,并逐渐衍生出授徒讲学的书院。杭州的风景胜地自然成为不少士人隐居之处,这些地方也往往是禅林寺院林立之地,一些士人便将书院直接设在寺庙道观之内。

二 唐五代时期的杭州书院

有唐一代,可供稽查的杭州地方文献十分稀缺,到五代时期,虽已有一批文献可供查阅,但其中关于书院的记载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关于唐五代杭州书院的情况,只能从后世的地方志等记载中进行查考。据文献记载,唐五代时期杭州至少已有青山书院、方塘书院、上贵精舍、径山书院4所书院。

青山书院,在寿昌县(今属建德)西南10里,唐诗人翁洮创建于光启三年(887)后。

关于青山书院,在万历《寿昌县志》中有明确记载:“青山书院在县西南十里,去航川里许青山之阴。唐隐君翁洮建。遗址犹存。”^[1]

书院的创立者是唐代诗人翁洮(字子平),睦州寿昌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广明中前后在世。光启三年(887),翁洮登进士第,官主客员外郎,后退居不仕。唐僖宗征召为官,翁洮作《枯木诗——辞召命作》以答诏,诗云:“枯木傍溪崖,由来岁月赊。有根盘水石,无叶接烟霞。二月苔为色,三冬雪作花。不因星使至,谁识是灵槎。”僖宗嘉慕不已,复遣使赐以曲江鱼。宋代理宗追谥翁洮为善庆公。翁洮擅长诗歌,《全唐诗》小传载:“字子平,光启三年进士第,官主客员外郎,归隐青山,征召不起。诗十三首。”^[2]可见,青山书院创建于光启三年(887)之后,是翁洮隐居读书、聚徒讲学之处。

方塘书院,在建德大慈岩镇吴山边村,唐时建,创建者不详。

据《吴山边村吴氏宗谱》记载,吴钦和翁洮都曾在方塘书院讲学,“钦,好学重友,与翁洮讲学方塘书院。”^[3]可见,方塘书院是吴氏家族的家族书院。

上贵精舍,在淳安常乐乡(今左口乡),五代时期方昊创建。

嘉靖《淳安县志》中明确记载了方昊创立上贵精舍的事情,“唐亡,耻非所事,隐居岩谷中(地名上贵里,今名奎星桥堂山)。钱镠招之,不肯往。聚徒讲学,终其身。”^[4]

清人吴任臣编的《十国春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方昊,字太初,青溪人。昊生于唐末,唐亡,耻非所事,遂居岩谷中。吴肃王常召之,不肯往。聚徒讲学,于上贵精舍,以终其身。乡人化之,称为静乐先生。”^[5]

^[1] (明)李思悦、洪一鳌、李世芳等:《(万历)重修寿昌县志》,卷3,国家图书馆藏本。

^[2] (清)曹寅:《全唐诗》,卷667,《翁洮》,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吴山边村吴氏宗谱》,建德图书馆藏本。

^[4] (明)姚明鸾修,余坤等纂:《(嘉靖)淳安县志》,上海古籍书店嘉靖三年(1524)影印本,1981年版。

^[5]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8,《吴越·方昊传》,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书院的创建者是方昊,字太初,人称静乐先生,唐青溪(今淳安)人。据《方氏家乘·世系》,方昊为唐末方姓一世祖,长子方祁,分迁高坊、石峡等处;次子方郇定居富山。宋代名儒方闾、方闻、方镛、方有开、方逢辰、方一夔,皆方昊之后裔。

书院所在地常乐乡,据南宋淳熙丙午《严州图经》载,常乐乡辖里有高贵、上贵、绫烂(林兰)、杨岸、下渚、龙源、山下、布山。上贵精舍在贵溪畔,溪中有一对天然石鲤鱼,故有“鲤鱼上天堂”之传说。

南宋咸淳八年(1272),淳安知县应与权,就上贵寺建祠祭祀方昊。上贵精舍的旧土今尚存,位于千岛湖镇达左口乡奎星桥村。

由此可知,上贵精舍建于五代时期,并已有聚徒讲学的功能。

径山书院,在临安(今余杭)径山,创建于五代时期,创建者不详。

据《吴越备史》记载,吴越王钱镠经常到径山书院游玩,“王常游径山书院,有道人洪湮者,每迎于门,王颇恶之。一日,自后山僻径而往,湮亦迎焉。王问其故,湮曰:‘君非常人,故预知耳。’”^[1]

从记载推断,书院应建于道观内。有人认为创建者是文中所提“道士洪湮”,但书院也可能早在洪湮之前就已创立,目前又暂未发现其他文献中关于径山书院的记载,故这种说法也只是猜测而已。至于径山书院有无聚徒讲学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文献记载中,青山书院、方塘书院、径山书院均以书院命名,但径山书院是否为读书讲学之处尚不清楚;青山书院为读书治学之所,可能并无聚徒讲学;方塘书院虽以书院命名,估计也停留在家族族学阶段;上贵精舍无书院之名,然有书院之实,在方志中明确记载有讲学,但生徒规模、讲学内容等具体情况也无处考证。可见,唐五代时期杭州书院仍处于萌芽阶段,尚无后代书院的典型特征。

第二节 北宋时期杭州书院的初步形成

北宋时期,全国政治中心虽在北方,但经济重心已移至江南,杭州在当时已是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政治地位也十分重要,在宋真宗时就是“天下重地”,被形容为“东南之奥壤,号繁剧之名都”^[2]。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需要,促进了杭州教育的全面进步,唐五代时期脱胎于家学与士人读书修学之所的书院,借助于政府的三次兴学运动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一 北宋时期杭州书院概况

关于北宋时期的杭州书院,仍因史书缺乏记载,只能从零星的史料中钩稽出几所书院的概况。

寿昌默山书院,位于今寿昌西南2里的默山,由进士胡楚材于庆历六年至庆历八年间(1046—1048)建立。关于默山书院,乾隆《敕修浙江通志》卷29中记

^[1] (宋)范垫、林禹:《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四库丛刊续编景清钞本。

^[2] (宋)蔡襄:《蔡襄集》,卷30,《杭州谢两府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27页。